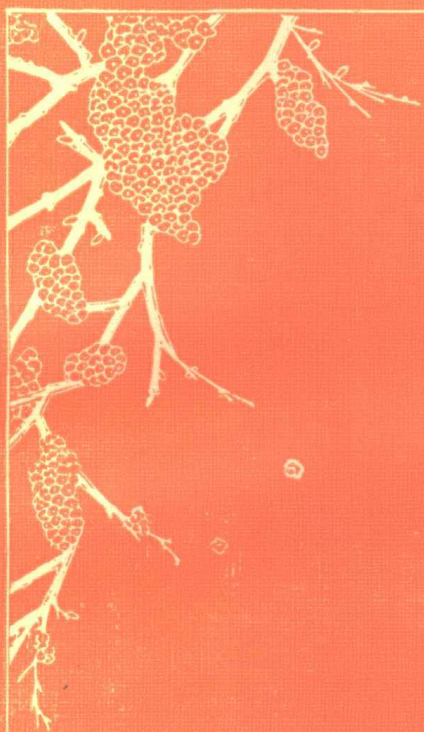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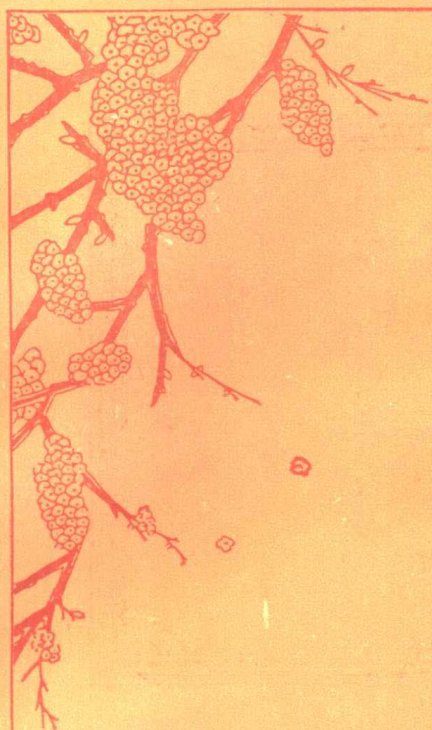




詩集

程应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詩集

程应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流 金 集

程应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插页 6 字数 260,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5-1837-x

K·189 软精 定价: 17.70 元

友人问疾德基复有长信诗以答之

忧患余生最自珍，
病魔潜袭已兼旬。
文章又见流传日，
议论终须不傍人。
得失久谙关世运，
荣枯每惧损天真。
莺花三月江南夜，
怀远思亲一怆神。

作于一九八二年春

谨向恩师献上我们的一瓣心香

丁 果	毛履平
成勤康	刘 昶
李幽兰	吴熙雯
萧国蓉	何健全
沈燕飞	邵华强
周珊珊	金重仁
赵昌洪	姚 蒙
俞令仪	徐小群
董邦安	程兆奇
虞云国	蔡美莉
瞿德霖	

(按姓氏笔画排列)

前 言

“廿八投冠归，传经甘藜藿”，这是业师程应镠先生自述经历的两句诗。从那以后，半个世纪的岁月荏苒而曲折地逝去了，今年欣逢先生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我们这些曾有幸亲聆教诲的弟子，或身处华土，或客居异邦，共同发起为先生編集出版了这部文集，作为在这一纪念日奉献给老师的一瓣心香。

—

先生曾多次对人说道：“我首先是一位教师，不是什么学问家。”这固然是先生自谦，但也确实反映出教师生涯在先生的人生历程与自我评价中的重要地位。五十年来，先生做过中学教员与校长，也当过大学教授和系主任，始终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历史教育园地中耕云播雨，育桃栽李。

在学生心目中，先生不仅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传道授业者，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以自身的道德风范、人格力量教育、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并且在历史教育上有其独具特色的见解和实践。

在先生身上，中国传统美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尤其推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这些都是崇高的理想。先生深切领会了传统文化中这些民主性精华，并在一生中身体力行。同时，先生又接受了五四以来新思潮、新文化的洗

礼、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等等思想观念也溶进了他的血液中。可以说，正是两种文化的交融结合铸就了先生独立特行的人格。

在抗战军兴的年代里，先生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从事过八路军的宣传工作，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从12·9爱国学生运动到昆明12·1惨案，乃至后来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先生无论是身为学生，还是身为教授，都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代表着进步的学生一边。1949年以后，先生先后担任过一系列教育与学术的领导职务，展示了他的魄力和组织才能。他期望能为教育与学术的繁荣昌盛干一番事业，为国家培养好一代学子，为后人留下更有价值的文化财富，而从不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他的作风是雷厉风行的，他的个性是直言不讳的，在工作卓有成效的同时，或许也得罪了一些人，但先生一直信奉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古训，而这正是先生人格的光采之处。在1957年以后的近二十年间，先生的命运完全任凭着政治运动而颠簸沉浮，然而即使是在“谪居犹忆日如年”的岁月中，他的处事原则与为人信条依然是“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不枉道以从世，保持着自身独立本色的人格。在先生身上，最令学生肃然起敬并且深受教益的，正是这种一生追求进步，向往民主，不计自身得失，专利生民国家，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人格精神。

在历史教学上，先生既具深度，又富魅力。这种深度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开拓与展延，而且更是出于对中外历史广博而深刻的把握，在关键点上旁征博引、中西比较，顺手拈出，随时点化，使听者豁然会悟，欣然有得。先生的讲课，高屋建瓴又挥洒自如，有时激越雄辩，使人奋立；有时深沉低徊，引一、二句古诗，恰到好处地把学生带进另一境界。我们都还记得，先生在为历史系、中文系七九级讲授中国通史时，大阶梯教室为之爆满的盛况。很多学生说，听先生讲课，确似一种艺术享受。一位五十年代初期的学生多年后还说起，先生讲法国大革命，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的形象始终在他心

目中栩栩如生。然而，要达到这种浑然一体、挥洒自如的境界，需要付出多少创造性的艰苦劳动啊！先生反复强调：“最主要的是学习，比在大学读书时还要学习得认真，为培养人而学，为未来的建设者而学，为那些将要超过我们的人而学。”他自述自己的感受，“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懈的努力与追求，正是先生几十年教学成就不竭的源泉所在。

先生曾对教师提出这样一个标准，认为“仁且智，就是个最好的老师”。回顾先生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其学识、文章展现了他的智，其道德、人格凝聚着他所崇尚的仁。作为一个教师，智固不易，仁尤为难，而先生既仁且智，这是弟子们深为庆幸，引以自豪的。

二

先生虽自谦不是学问家，但作为历史学家，无论在思想方法上，还是在学术成果上，他都给学生以弥足重视的见解。

在学术思想上，先生既深受传统史学的濡染，又汲取了现代新史学的理论方法，两者交融结合，从而形成先生自己的治学方法与风格。先生充分肯定由刘知幾首倡，章学诚补充的“史学四长”之说，认为“现代能写出一本可称为史学的著作的，也必须具备这四长。”在史学的功能与作用上，先生主张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因而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与司马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深为推崇，以为他们“以古为鉴的作史目的，实际上也是在史学的领域对古今关系的一种解决。”先生所主张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历史研究应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帮助当代人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大势；二是指总结历史上某一方面的具体的经验教训，作为当代相当问题的借鉴。

先生强调“学问之道，在于求真”，因此十分重视史料功夫。他自述在大学时代“所受的史学方面的训练，考证、校勘占的份量颇重”，这种传统史学的早期训练，以及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的经历，形成了先生在治学方法上重视史料功夫的特色。他认为“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他赞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在某种意义来说，开创了我国求实的学风”；他肯定清代朴学中有“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先生论文中《释幹》、《释吏》、《释新民》及《宋代都市发展两证》等纯为考据学派的路数，从中可窥见先生考证史料，运用史料的娴熟功夫。对研究生，先生布置第一年的日课就是逐句研读《资治通鉴》，通过追溯史源、比勘史料，初通目录、版本、校勘、考据等史科学基本方法，并通过全面认真地研读这部通史名著，打下研治中国古代史的系统坚实的史料基础，这一做法实为用心良苦，用意良深。

然而，先生治学并未驻足于史料考据的狭迫繁琐的天地中，五四时代以来的新思潮促成了他治史方法的另一侧面，即重视理论，推崇会通。先生认为：“史料不等于史学，不论他掌握了多少史料，都不能说他是史学家。”“霸业千秋余古迹，议论终须大手笔”，这两句诗表达了先生对史学研究中理论的高度推重。先生强调的史学理论修养，有其特具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有理论追求的勇气，他曾指出：“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领袖，绝不是科学的态度。”他经常引用张载的诗句“剖破藩篱是大家”，提倡好学深思，不为前人与他人所囿，也不为自己所囿。剖破藩篱，解放思想是提高史学理论修养的前提。其次，对理论的追求是不应该有止境的。先生认为理论是随事物的变化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永无休止，理论的完善也没有尽期。因此，“认为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其三，先生所说的史学理论并不仅仅狭隘地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经我爱他山石”，这史学理论的他山之石，包括了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切对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

的理论遗产。

如果将史料基础喻为骨肉，理论修养譬为魂魄，那么文字表达则是仪貌，三者缺一不可。先生自幼养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至老不衰。他在大学时代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曾追随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从事过文学创作，结集为《一年集》，其中作品所具有的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清丽的文字风格，是颇有点沈从文的流风余韵的。也许正是这种文学上的爱好、修养与经历，致使先生在治学方法上特别讲究文字的表达。他的史学论著，尤其是《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论林逋》等人物研究的作品，无不形象生动鲜明，文字清峻雅洁，看似漫不经心地写来，绝无斧凿的痕迹，却有一种文情并茂、摄人神魂的魅力，令人开卷难以释手，堪称史学与文学相当完美的结合。先生曾对张荫麟先生三十年代所写的那些“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的历史名篇”表示过钦佩，他的《南北朝史话》似乎就受到这种表达方式的影响。这本篇幅不大的《史话》，曾被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周一良先生推许为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而全书却基本不引旧史成文，娓娓写来，意味无穷。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追求史学著作在文字表现上的信、达、雅，其中《崔浩之死》一节竟先后属稿达十一次之多。先生的研究生，都经过作文一项考试方得入其门下，作文的优劣是录取标准中最重要的参数。这种做法在全国历史专业研究生招生中是别具一格的，但又确实是独具只眼的高明之举，因为事实正如先生所说：“不能设想一个文理紊乱的人将来能进行思路清晰识见敏锐的科学研究。”

总之，先生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却不主张仅以罗列史料为能事；推重理论，但亦反对游学无根的空疏之论。他认为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结合，卓特的史学成果与生动的文字表达的结合，是可以也应该在一个优秀的史学工作者身上完成的。先生所推许的剖破藩篱的史学大家，应该在史实史

料方面具有广博精深的素养，并能把握历史发展中带有普遍性或关键性的课题，以新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精炼优美的文字表述，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取得超过前辈学者的卓越成果。这些，也许就是先生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微言大旨所在。

三

这部文集以先生使用过的笔名命集，原拟分学术与诗文两编。先生在旧体诗上素有爱好，深具修养，其风格略近宋诗，尤其是七律受陆放翁的影响较为显见。从青年至老年，先生的诗作若断若续地钩摹出他的一生，或叙经历，或抒情怀，或发议论，对了解先生的思想感情、道德人格是最可珍视的文字材料。其他文学性作品则是先生文学活动的雪泥鸿爪。然而，限于各方面的条件，诗文编的付梓，只能俟诸异日。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流金集》的学术编，因篇幅所限，我们未能将先生的几部专著收入；又因搜集不易，亦未能将先生在1949年以前所写的有关中外历史方面的论文收进。因此目下的学术编论著大多是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这十年左右的学术文章。全编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文章，其中《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是学术界最早全面探讨这一问题的力作，《论北魏实行均田令的对象与地区》则是对众说纷纭的北魏均田制持独立见解的一家之言，其他各文也可使读者管窥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是有关历史人物研究的文章。在这方面，先生有其深思熟虑的见解和独具风格的实践。先生主张不仅要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还必须从其所处的地域的经济、交通、教育或其他各方面加以探究；主张在把握历史人物思想行事最本质、主流的

那部分的同时，也不忽视非本质、主流的那一部分，只有全面了解，才能使人物有血有肉；他尤其强调应着重研究历史人物与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在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纵深开掘中，使人物的个体研究获得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氛围。这部分的文章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生的有关理论和实践。

第三部分是先生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国学概论》课程的讲稿。作为深谙教学规律的教师，先生恰当地把握了学生所能接受的深度，尽可能地以浅显的文字表述，体现了一位老教育家对青年学子的循循善诱。而其内容对一个初涉文史的人来说，实属一部较好的入门读物。同时，在词浅意深的讲述中，亦时时可见先生的真知灼见。难怪不少弟子至今仍对先生的这门课记忆犹新。

第四部分是有关宋代历史的论述。在宋史研究方面，先生著有两部人物传记，第三部《苏轼传》也久在酝酿之中，不过其主要实绩却在史料整理与工具书编纂上。他是《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两部卷帙浩繁的宋代史籍标校整理的主要组织者与定稿人。他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这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辞典，也是第一部宋史研究的工具书。先生曾为这些工作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并为这些工作能为学术研究起“开路搭桥的作用”深感欣慰，而这些成果，都不是这部集子所能反映的。

先生自大学时代起即把史学视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但是在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他没有也不可能躲进学术的象牙塔，而是“南北此心系烽火”，为中华民族的安危，为民主政治的开创，尽心竭力。解放后，先生虽然向往“四壁图书供啸傲，一灯文字任纵横”的研究生涯；但仍服从需要，投身于百废待兴的中等与高等教育事业。1957年以后的近二十年间，众所周知的原因剥夺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和条件。“艰辛岁月天难问”，不幸的遭际是不堪回首的，而更令人扼腕太息的是“哀乐中年感逝川”，先生最富创造力的中年岁华随这苍天难问的逝川一去不复返了。直到七十年代末

期,先生才“登临敢说兴亡事”,有了“文章又见流传日,议论终须不傍人”的学术研究的可能。然而,百废待兴的情势又一次把先生推到教育、学术的领导职位上。为了全民族的教育事业、学术事业的复兴,先生把晚年的主要精力倾注在工作上,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重建与古籍所的新创,为古籍整理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宋代史籍的校点整理,释放出最后的光和热。然而,即便如此,先生还是挤出时间,实现自己“著述可待笔生花”的夙愿,从1978年到1987年的十年间,他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学术论著。惜弟子无能,未能将它们全部整理出来,因此这部文集的学术编并不能反映出先生史学的实际与全部。尽管如此,却仍可折射出先生一生的学术方向、要旨与风格。

学生为老师编定文集,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的。对于学生来说,老师的教诲,从宏篇谠论乃至片言只语,都具有特殊亲切的意味。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字使老师的人格、学问再度在学生的中心中活现,并由此引发对自己学生时代温馨而永恒的回忆。应该说,我们为先生编印这部文集,首先感怀的正是这种素朴的师生之情。先生曾自叹“报国谁知白首心”,许多亲聆过教诲的学生都深知老师这片赤诚之心是九死不悔的。如果这部文集能使更多的人了解先生的学识、人格及拳拳报国心,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而病中的先生也会因此感到欣慰。

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我们在先生执教五十周年之际,献上这份心意的同时,还想说的是,先生无论在人格道德、学识文章上都是我们敬重的老师;师恩是没齿难忘的,师道是仰之弥高的,先生半个世纪所从事的业绩在社会大生命中将是传之久远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注:文中引文除注明出处的,皆出自先生的诗文。

纪念程应镠先生从教五十周年



程应镠先生像

友人問疾德基復有長信

詩以答之

憂患餘生最自珍
兩魔潛影已無旬
文章又見成仙傳
日議論終須不傍人
得失久
諳因在運榮枯無懼損
天真
當若三月江南夜
懷遠思親

一驚神

詩余

目 录

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	1
论北魏实行均田令的对象与地区·····	21
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	40
王导治理江东政策试释·····	50
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讲稿)·····	61
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	71
释“幹”——读南北朝史札记之一·····	89
释“吏”——读南北朝史札记之二·····	97
释“新民”——读南北朝史札记之三·····	101
〔附〕	
从“李弘”想起的·····	105
司马逸和谢逸·····	106
谈历史人物的研究·····	108
《范仲淹新传》自序·····	119
让逝去的巨人重新活现——就《司马光新传》答客问·····	123
论林逋·····	128
书王荆公《明妃曲》后·····	134
国学讲演录·····	141